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下)



邓小平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

安徽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崔正起 韦定广 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皖)新登字 01 号

邓小平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崔正起 韦定广 主编

责任编辑：丁怀超 特约编辑：生 全
封面设计：韦君琳 责任校对：刘 燕
出 版：安徽人民出版社
发 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合肥市总工会义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5
字 数：210000
版 次：199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212-00915-6/D·161
定 价：10.65 元(本册定价：4.95 元)

(本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说 明

为了深入学习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了充分反映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所做出的历史性重大贡献,为了便于了解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们将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论述选编成书。在编辑体例上,我们采用问题归纳和时间线索相结合的方法,即首先根据党的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将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分为十个方面,然后又把每一方面按照理论逻辑分为若干观点,在每个观点中再按时间顺序编排有关论述,从而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选编力求准确精炼,使主要观点没有遗漏。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此,本书除了突出邓小平同志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外,还摘录了江泽民同志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部分重要文献中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论述。这些内容也按时间顺序附于每一部分之后,以供参考之用。

本书由崔正起、韦定广主编,参加选编人员有:吕双旗、武善彩、杨国炎、崔昊、王中田,其中武善彩和杨国炎还参加了最后的整理、统稿工作。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空军政治学院的院、部领导及空军政治学院政治部宣传处、训练部函研处、学员14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目 次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1)
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
2.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2)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18)
1.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	(18)
2.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1)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27)
1. “社会主义的本质”	(27)
2.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5)
3. “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39)
4.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靠科技和教育”	(42)
四、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47)
1. “改革是必由之路”	(47)
2.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一场革命”	(49)
3.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54)
4.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58)
5. “根据国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72)
6. “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89)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6页。

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

.....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09页、114页。

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

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而与此相反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则“是共产党的最大敌人，是工人阶级的最大敌人，是人民的最大敌人，是民族的最大敌人，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根据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

.....

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讲过，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

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112页、113页。

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

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

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123页。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

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日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

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133页。

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列宁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象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已经说过,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158、165—166页。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我们在国际阶级斗争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比如现在很需要人才,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

不好这件事，交不了帐就是了。还有些事情，有的地方只会照搬，上面没有指示就不敢动，这能叫解放思想？我们多次讲过，就是一个生产队，也应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本生产队的具体问题。我看，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末，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244页。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页。

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你们讲要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与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附 录

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精神。思想不解放，脑筋不换，一切工作都很难推动。思想解放了，脑筋活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无论是发现和选拔人才，无论是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无论是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事业，办法就会更多，路子就会更广阔。所以可以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去开拓进取。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1992年6月14日新华社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

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2.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50页。

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

《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1980年5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